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 宋庆龄

崔艳秋 编写

新华出版社



##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编：苏双碧  
副主编：陈君聪  
编委：李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铃  
马宝珠  
责任编辑：张传秀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宋庆龄**

崔艳秋 编写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29,000字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011-0714-9/K·96 定价：0.85元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 宋庆龄

崔艳秋 编写

## 目 录

- 一、祖籍海南 出生上海 ..... 1
- 二、异国求学 立志报国 ..... 5
- 三、追求真理 投身革命 ..... 10
- 四、志先生之志 行先生之行 ..... 19
- 五、抗日救国 身体力行 ..... 26
- 六、为新中国而奋斗终生 ..... 40

历史，在经历了无数次沧海桑田的巨变之后，带着骄傲，带着憧憬，即将跨进崭新的二十一世纪。但她不会忘记，曾为埋葬封建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不遗余力，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而奔走呼号，为追求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忘我献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繁荣而鞠躬尽瘁的一代风流人物。这其中就有这么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恬静，高雅，温柔，睿（rui）智，象高山白雪那样令人叹而观止，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方式，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她的名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响亮，与世界和平、民主一样令人神往，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

## 一、祖籍海南 出生上海

1893年1月27日，在上海一个既是传教士，又是教师和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党人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小生命。她就是宋庆龄。父亲因为是传教士，所以给她起了个教名叫做露瑟萝，学名叫罗莎蒙黛（Rosamonde）。

父亲名叫宋嘉树（1866—1918年），原名乔荪（sūn），字跃如，西名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ong）。原姓韩，是客家人韩宏义之子，1866年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由于家境贫寒，12岁时就过继给姓宋的舅父养育。他的舅父也是海南岛文昌县人，此时已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设一家小商店，经营中国的丝茶。因为膝下无子，

故愿收其为养子，并将其韩姓改为宋姓。

1878年，宋嘉树来到美国，一度在舅父的丝茶商行当学徒。在这期间，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常去他那个小店铺，向他讲述一些学校生活的故事，有时甚至还讥笑他整天秤卖茶叶没出息。这对宋嘉树无疑是一种刺激和挑战。以后，每次中国留学生的来访，都增加了宋嘉树对美国教育的神秘感。有一次，他向舅父说出了要读书的想法，不料这个因循守旧的舅父干脆地回答他“不可能”。

寻找支持的希望破灭了，但探索外面陌生世界的强烈欲望，终于支撑着还不满14周岁的宋嘉树，干出了一件在当时中国年轻人中间闻所未闻的事：他逃跑了，跑到了一艘正准备启航的税收巡行船上。这个东方孩子的胆量深深地感动了船长，也博得了船员们的好感，于是他被留下作侍童。船长是个心地善良的基督徒，每到星期天，他总是详细地向宋嘉树讲述圣经的故事。1880年11月，宋嘉树正式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教徒。随后，他进入教会学校读书，曾先后在威明顿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和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毕业时，他曾想留在美国学医，但教会却要求他到上海卫理公会布道团林乐知手下工作。于是，宋嘉树于1886年乘上火车，横穿美国，再搭轮船，到达上海。

回国后，宋嘉树在上海美以美教会传教，兼在教会中学任教。1892年，他辞去教会职务，转营工商业，创办美华印书馆，出版了中文圣经及其他宗教书籍，他同时还任上海福丰面粉厂经理。宋嘉树辞去教职后，仍活跃于宗教界，他创

办的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与美国的上海圣经公会有密切往来。1892年，他结识了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成为孙中山的热情支持者和挚友。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1869—1931年），浙江省余姚县人，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为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她贤淑而有教养，聪明敏锐，性格开朗，不信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妇女解放，是一位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妇女。她曾在上海教会办的培文女校任教员，热心慈善事业，经常参加上海艾伦纪念教堂的活动，结交了许多西方教会的朋友。1887年与宋嘉树结婚。

宋嘉树与倪桂珍的婚姻，虽然不能说是门当户对，但他俩的意志、职业、情趣却都有共同之点，夫妻之间情投意合，感情笃（dǔ）深。倪桂珍小时候曾象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一样试着缠足，后因感到痛苦难受就放弃缠足，成为与众不同的大脚闺秀。结婚前，她曾试探宋嘉树，对自己的大脚有何感想。宋嘉树幽默地答道，我就是要娶“大脚”为妻。婚后，他们居住在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的一幢小洋房里，共生有三男三女六个孩子，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宋氏三姐妹和三兄弟。宋氏夫妇的英俊洒脱、抚美俏丽，塑造了他们子女的外貌，而他们的学识情趣、志向和活动，更是极大地影响着宋氏兄弟和姐妹。

宋氏夫妇把三个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大女儿霭龄，聪明倔强，生于1890年，1909年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1912—1914年间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4年与孔子75代孙

孔祥熙结婚，转而协同丈夫经营以山西为基地的家业和铭贤学校（该校于1919年成为美国奥柏林大学的附属中学）。1928年后，因孔祥熙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等职，即以夫人身份参加一些社会活动。1948年国民党政府衰败时，全家移居美国。小女儿美龄，个性顽皮、自信。1908年随其二姐出国赴美求学。1927年12月与蒋介石在上海结婚，婚后担任蒋的私人秘书和英语翻译。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即从台湾移居美国。二女儿庆龄，性情刚毅，温柔娴静，举止端庄，体态优美。相比之下，最得父母的宠爱。所以宋嘉树常对人夸耀说罗莎蒙黛（庆龄）“是我们快乐的源泉”。

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这一年，孙中山撰写了一篇洋洋8千多字的《上李鸿章书》，他从上海来到天津，希望能见到李鸿章，陈述国事。可李鸿章既没有接见他，也没有理睬他的改革方案。孙中山遭到冷遇后，怀着革命的义愤，又回到上海，经常住在宋嘉树家，与宋畅谈革命。不久，宋加入了兴中会，并担任孙中山的部分秘书工作。他还以印刷圣经为掩护，为革命党印制进步书刊和宣传资料。他的家因此也成了革命党人秘密集会的地点，宋嘉树不仅在政治上与孙中山同心同德，而且在经济上也大力资助革命活动。

由于孙中山和宋嘉树过往甚密，因此很早就与孩提时代的宋庆龄熟识。1900年，当宋庆龄还只是7岁的孩子时，就问孙中山：“您是革命党吗？”孙中山向她点头示意。她又

问：“我跟您一道去革命好吗？”孙中山回答说：“罗莎蒙黛，你还小，你现在要读书，掌握了知识，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孙中山痛感人间不平而终身投入革命”的献身精神，在宋庆龄童年纯洁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如同父母一样，仰慕孙中山，爱戴孙中山，视孙中山为革命英雄。庆龄曾对人说：“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来，就忘了一切——家庭、学校等等。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却担心着中国”。

## 二、异国求学 立志报国

宋庆龄七岁那年，在上海八仙桥附近的“三一堂女塾”读书。她学习非常用功，善于思考问题，对英语和文艺尤为喜爱，曾在话剧排演中，得到老师的赞扬。她还深受家学熏陶，擅长琴、棋、书、画。

1908年，宋庆龄十五岁，父母就把她和妹妹美龄一起送往美国读书。宋氏夫妇非常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常对三个女儿说：“你们虽是女孩，但这并不妨碍你们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公民，我们要统统送你们到美国去读书”。

到美国后，宋庆龄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准备投考大学。同年即考入了乔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入学后，宋庆龄博览群书，认真研读中国历史和哲学，扩展了知识面。她曾担任学校院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讯秘书。



由于她才思敏捷，勤于思考，常有独到见解。因此，同学们都愿意和她在一起。一次有位同学问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多地考虑国家的事情？她回答说：不能忘记中国，也不能忘记孙中山所说的那些话，“如果忘记了，人生就失去其意义”。在异国求学的整个时期，她学习十分努力，并深切地关心着中国发生的一切，总想回国后能有所建树。

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时，曾发表过一篇习作，题为“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文章写道：“数百年来，中国的政治都是以用人唯亲和尔虞我诈为特征。政府的各种职位，全为御用书生和宫廷亲信所充塞。……他们根本不懂科学管理，甚至连一点希图治国的才能也没有。人民的悲惨状况，频繁的骚动和起义，都是这种选拔‘能干官员’的不光彩的方式带来的后果”。接着她又写道：中国的青年到国外留学，有助于中国的改革。如他们帮助中国建立戒烟会，使吸鸦片的人永远解除自己的恶习；又如他们在城市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使人们有个社交集会的活动场所。她还在此文中尖锐地抨击中国女子缠足的习俗礼法，赞扬中国青年的进步表现。她说：“中国青年不再象过去那样习惯于认为变形的脚是漂亮的，或者是要求女人缠脚。现在，他们拒绝同缠足女子结婚，他们甚至解除童年时代的包办婚姻。这在中国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对祖国的热爱，驱使宋庆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而肯定中国的过去和将来。

1911年10月的一天，学校组织别开生面的历史讨论课，

讨论的题目是“历史进程与历史演变”。当议论到中国的时候，一个金发女郎发言说：世界文明的中心曾经很长时间是中国，后来是欧洲，现在是美洲，是年轻的美国。她还说：我看不出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听到这里，宋庆龄霍地站起来，用流利的英语说道：“历史确实在不断地变化，盛极一时的中国已经落后。但是，我不同意中国已经被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的说法。因为，这个观点没有考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文明古国，既然对世界的昨天发生过重大影响，就不可能不对世界的今天产生巨大影响”。

接着，宋庆龄满怀信心地说：“中国的现实是，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事变，许多仁人志士在组织革命团体，他们正在流血，正在奋斗，以唤醒中国的民众”。

这时，有个同学插话说：“罗莎蒙黛，假如你在中国，这样讲会被杀头的！”

宋庆龄敏锐地接上去说：“一点不错，是会被杀头的，而且有许多仁人志士已被砍去头颅。但是，如果非流血不足以唤醒中国民众，那么，一场流血的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革命现在虽然没有胜利，但总有一天会胜利。”宋庆龄又说：“大家都称道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不错，他们都是伟大的人物，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对于世界，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但是人们在称赞拿破仑的时候，却常常忘记了他这样一句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一旦醒

来，它的吼声是会使恶势力恐惧’。现在，这头睡狮开始醒起来了！我还要高兴地告诉同学们，我们的祖国一样有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那样的杰出人物，未来的历史将证明这一点。”

她的教授非常惊奇这位中国学生有如此高超的见解，于是便问宋庆龄：“你这些不同凡响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宋庆龄回答道：“中国社会一切不公平的现象，迫使我考虑这些问题，还有我们家的一位客人，我的一位朋友的思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她还说：“我的祖国不乏人才，我们的人民不乏聪明的气质和刻苦的精神。”

教授顺便想再考考她，于是又提出一个问题：“从历史课上学到的，你觉得哪件事最重要？”“我想，一个民族在其发展及其在世界的地位上，不唤起全民族的精神，就不能有真正的进步。”宋庆龄这一具有卓越见解的回答，再次得到了教授的极大赞赏。

听了她的发言，同学们夸耀说：“我们的罗莎蒙黛，性情温柔，可讨论起来则慷慨陈词，雄辩滔滔。”

1911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一年。在革命党人长期致力于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斗争中，终于爆发了石破天惊的辛亥革命。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在大总统就任典礼的仪式上，宋庆龄的父母、姐弟都坐在会场前排的位子上，与孙中山一起分享着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

事后，宋嘉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并把象征着共

和的五色旗寄给了她。当她收到父亲寄来的信和邮包后，兴奋地连声高呼“共和万岁”，并把代表清朝的旗帜扔在地上，把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五色新国旗挂在墙上。她对同学们说：“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使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君主专制，走上共和国的道路，这无疑是世界进步史上的一个碑石！”

宋庆龄对辛亥革命有很高的评价，她把这次革命看成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事件。不久，她奋笔疾书，用英文写成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论文，来表达自己赞颂辛亥革命胜利的心愿。

宋庆龄在论文中写道：中国辛亥革命，“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制度已持续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人民毫无‘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言，这一业绩也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这个王朝所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使得一度兴盛的国家沦为极度的贫困”。

宋庆龄说：在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的心底里，不管他是政治家还是劳动者，都蕴蓄着反对清朝政府压迫的情绪，就是这种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的而实际是造福人类的喜事”。

她还明确指出：“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每个人的两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争取它们，许多高尚英勇之士献出了生命。但是博爱尚有待于争取”。文中预言：“通向博爱之路的任何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

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努力中，中国还要在其它方面起作用”，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她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中国是首先创建了刑法法典的国家，她的哲学家对人类思想作出过某些最宝贵的贡献，她的浩瀚的文献赢得了学识渊博的、终身从事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的赞赏，她的社会 and 道德伦理的准则，几乎是任何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对他们来说，笔比剑更有力量。他们尊重和平这门学科，而漠视战争这门学科，他们崇文轻武。”“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起来。它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

宋庆龄的这篇论文含有深刻的哲理。这对一个18岁的少女来说，实属难能可贵。历史的使命感，又将驱使这位少女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 三、追求真理 投身革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913年春，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从此，她告别了5年大学生活，开始了人生的新里程。

这时的宋庆龄，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的新女性。她感到中国革命在召唤她，她必须立即回国投身革命。

然而，国内的时局又发生了变化。正当人们欢庆辛亥革命的胜利，欢呼共和万岁的时候，北洋军阀袁世凯却通过阴谋手段，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袁世凯上台后，就开始了复辟帝制活动，开始了反动的、独裁的军阀统治，致使中华民国有其名而无其实。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革命党人宋教仁，革命党人义愤填膺。7月，孙中山发动了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但不久遭到失败。不得已，孙中山再次逃亡日本。此时，宋嘉树也因宋教仁案的缘故，携夫人、霭龄等一道东走日本，以免遭不测。他们先后在日本的神户、东京、横滨居住。

宋庆龄此时毕业回国，自然要先绕道日本，看望阔别5年之久的父母和孙中山先生。当她于1913年8月29日到达日本时，姐姐宋霭龄和姐夫孔祥熙代表父母在码头迎接了她。在异国他乡，骨肉团聚，全家人都有说不出道不尽的喜悦。

拜见父母大人后，宋庆龄就急着想去拜访孙中山先生。一则她受美国“当地孙中山博士崇拜者之托，给孙中山博士带来了一箱加利福尼亚产的水果”以及给孙中山的一些私人信件；二则宋庆龄对孙中山革命活动和革命精神的崇敬及仰慕，驱使她早日见到孙中山，以便加入革命的行列。可以说，这是宋庆龄想拜见孙中山的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

宋庆龄与孙中山见面的次数是比较频繁的。在短短的半个月里，两人就见了七、八次面。在交谈中，宋庆龄向孙中

山表达了自己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愿望。

最早担任孙中山秘书的是宋嘉树。宋霭龄从美国学成归来后便接替了父亲的工作。此时，巧逢她与孔祥熙结婚，便辞去了秘书职务。正当孙中山要重新物色合适的秘书人选时，宋庆龄毛遂自荐，主动向姐姐霭龄表示，自己愿意做这份工作。宋霭龄对她说：“你若肯做，倒很合适，但这是革命工作，很危险！”宋庆龄斩钉截铁地说：“一个人应该有献身精神，否则一事无成。革命不能怕危险，怕危险就不能革命”。

宋庆龄对革命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孙中山。最后，孙中山答应了宋庆龄的请求，让她正式担任自己的秘书，协助自己处理机密书简和日常事务，整理讲稿，起草电文，负责同中国各地和南洋的革命党人联系。由于宋庆龄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工作热情，因此深得孙中山的信赖。孙中山的所有机要通讯密码后来都由宋庆龄保管。

在频繁的工作接触中，宋庆龄进一步受到了孙中山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熏陶，提高了对中国革命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更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她曾默默地对自己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而孙中山反袁斗争迭遭失败，和流亡海外遇到的痛苦和孤寂，也从宋庆龄的支持和协助中得到了鼓舞和安慰。热爱祖国和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在患难中建立的深厚友谊与日俱增。爱情之神，也自然而然地把两颗跳动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

1913年至1915年，宋庆龄常往来于东京和上海之间，利

用工作之余，去看望早已回国的父母。1915年6月，宋庆龄又要回国探亲了。行前，她对孙中山说：“让我们结合在一起吧！”孙中山郑重地说：“罗莎蒙黛，你还是慎重一些吧，多考虑一些时候再作决定。你还年轻，只有22岁”。孙中山要她回上海后多听听父母的意见，然后再作决定。宋庆龄坚定地表示：“婚姻是个人的事，应由自己作主”。她说：“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

可是，宋庆龄的父母及亲友都反对这门亲事。宋嘉树对曾经是自己的朋友、同事，而不久将作自己的女婿，无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姐姐宋霭龄劝宋庆龄“跟另一个人订婚”。面对家庭的阻止，宋庆龄力排众议，当即决定和孙中山结为终身伴侣。她在给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信中写道：“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

10月，宋庆龄启程前往日本，与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的孙中山正式结婚。婚礼是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举行的。婚礼结束后，廖仲恺和何香凝带着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到孙中山寓所贺喜。婚后，宋庆龄在给她的美国同学安德逊的信中，对她和孙中山的婚姻是这样描述的：我和孙中山结婚，“是尽可能的简单，因为我俩都不喜欢繁文缛（rù）节。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语已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象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



试罢了”。孙中山对他们的结合也十分满意，在写给他的老师詹姆斯·康德黎的信中这样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宋庆龄的父母虽然不赞成女儿的婚事，但他们结婚时，父母还是送给了她很多礼物。诸如在广州制作的双人床、五斗橱、大衣橱、金丝绣花被、百子图的缎绣被面，以及刺绣礼服等等。

以后的历史表明，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合在一起，的确“能够成就他们分居时所不能成就的事业”。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便以夫人和秘书的身份“为中山先生服务”。同时，用她“辉煌的头脑，充实了她丈夫的头脑，完成了他更伟大的人格”，成为中山先生不可多得的助手、战友。

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宣布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决定翌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的复辟行径，激怒了全国人民。继反袁的“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再次举起反袁旗帜，领导了护国战争。在此期间，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在韶关、桂林、梧州等许多地方劳苦奔波，协助孙中山聚集革命力量，从事新的斗争。她还协助孙中山起草了第二次《讨袁宣言》。

1918年至1919年，孙中山困居上海，一筹莫展。一次次斗争的失败，使他几乎陷于绝望的境地。面对此景，宋庆龄一